

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第二辑)

度越海向台湾延伸,使闽台两
它以闽南方言和部分客家方言
民间信仰、民族习惯、
独特的文化风貌。尽管
与福建不同的遭
传统,表现
族本位的
形态的
同一

闽台 行政建置关系

许维勤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闽台 行政建置关系

许
维
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台行政建置关系 / 许维勤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12

(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 第 2 辑)

ISBN 978-7-211-05850-1

I. 闽... II. 许... III. ①政区沿革—研究—福建省
②政区沿革—研究—台湾省 IV. K925.7 K9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7585 号

闽台行政建置关系

MINTAI XINGZHENG JIANZHI GUANXI

著 者: 许维勤

责任编辑: 林小影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千帆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南平东路 86 号金城投资区新店楼 邮政编码: 350012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5850-1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台湾问题是萦系在海内外所有中华民族子孙心上的一个最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一个多世纪来，台湾无论沦入日本殖民统治，还是处在两岸对峙的政治纠葛之中，都是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着，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下，都不能把它和祖国分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民；台湾社会和祖国大陆社会一样，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的。共同的文化，是一股潜在的、巨大的力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系台湾与祖国密不可分的精神支柱。这一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中国人的纽带，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台湾与祖国的文化亲缘关系，最先、最直接的就体现为台湾与福建的关系。这是历史发展决定的。福建和台湾，都是以中原南徙的移民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稍有不同的是，在福建，中原移民南徙入闽，至宋代已基本完成；而在台湾，则是自明末清初开始，才由南徙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再度大规模迁入台湾的。其文化的传播，也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发展，再度播入台湾。因此，闽台社会都先后经历了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实质也就是中原化的过程。虽然在台湾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源自中原的闽文化经历了其在台湾本土的不同发展，但未能改变其源自中原的本质。闽台被视为一个共同

文化区，皆因其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密切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简言之，就是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追索闽台文化的来路，也必然寻根到中华文化的源头。作为闽籍的文化学者，我们无论在进行福建文化研究，还是在探视台湾文化的发展，都为闽台文化共同源于中华文化而又呈现出多样形态的魅力所感动，也深感有责任揭示闽台文化这种同根共源的密切亲缘关系，以便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推动两岸民众的认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

丛书既名“闽台文化关系研究”，顾名思义，是以“文化”为讨论对象，以“关系”为切入点，在闽台的背后，涵盖的其实是两岸，所涉及的也不单纯只是文化问题。它是以闽台为中心，以文化为重点，来论析两岸关系的一套系列著作。

“丛书”第一辑（十一种）出版之后，受到海内外各方面关心两岸问题的学者、读者的欢迎。由于种种原因，最初设想的某些选题，未能如期完成，有些选题，也一时未找到合适的撰写者，使第一辑丛书留下某些欠缺和遗憾。有鉴于此，2005年成立的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和海峡文化研究会，甫一诞生，便接过这项工程，着手组织省内相关学者，进行第二辑九个选题的撰写。希望两辑共二十个选题的这套丛书，能较全面、深入地反映以闽台为中心的两岸文化关系，为建设和谐海峡，贡献一分绵薄之力。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 东南开发浪潮与闽台建置	2
二 闽台政区与海峡文化圈	10
第二章 闽台地缘衍生的天然政治关系	20
第一节 地理学、考古学所展示的闽台渊源关系	20
一 闽台地理的密切关系	20
二 闽台早期居民的族源关系	24
第二节 大陆政权建立对台澎地区统治的早期尝试	31
一 中国早期文献所表露的对东南岛夷的统辖意识 ...	31
二 东吴政权延伸台湾的尝试和隋朝对台湾的探索 ...	35
第三章 福建行政管辖向台澎地区的早期延伸	43
第一节 宋元设治澎湖情形	44
一 宋、元设治澎湖之缘起	44
二 宋元时期的台湾社会状况	49
第二节 明朝的外患与台湾主权意识的明朗化	54
一 明朝对外交往中的台湾	54
二 外患严峻的形势下明朝对台湾地位认识的变化 ...	58
三 晚明设治台、澎的努力	64
第三节 移民开发与台湾主权	70
一 早期汉族移民与台湾的开发	70
二 有组织的移民活动与台湾的开发	77
第四章 郑氏政权与台湾建置	83
第一节 郑成功对台湾主权的明示	83
一 郑氏集团的海权意识及其与台湾关系	83
二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民意基础和法理依据	90

第二节	郑氏政权下的台湾行政建置	100
一	台湾行政建置的设立及其与明朝关系	100
二	明郑行政建置的运作及其沿革	105
三	明郑建置下的台湾经营与开发	111
第三节	文教设施的建立与台湾社会的内地化	116
一	明郑政权的文教政策	116
二	明郑教育制度的建立及其对台湾社会的教化之功	120
第五章	清朝统一台湾与台湾建置	124
第一节	清朝统一台湾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内在联系 ...	124
一	清朝统一台湾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因果	124
二	清朝对台湾认识的变化	130
三	以施琅为代表的闽籍官员对台湾建置的贡献	135
第二节	清朝台湾行政建置及其沿革	140
一	清初台湾行政建置区划及人口概况	140
二	移民开发与台湾行政建置的发展	144
三	近代国际法权挑战中台湾行政建置的完善	150
第六章	福建省治下台湾地方建置的运行	157
第一节	闽台地方建置的运作及其行政效能	157
一	闽台行政官制序列	157
二	闽台地方建置运行的特点	163
三	闽台行政系统的治理成效	168
第二节	闽台建置中两岸经济关系的强化	172
一	闽台经济的互补性	172
二	地方建置与闽台贸易的发展	177
三	地方行政官员眼中的闽台经济联系	181
第三节	闽文化的影响与台湾社会的进一步内地化 ...	185
一	清朝治台方略与文治化社会建设	185
二	地方行政建置与闽文化的传播	190

三	移民社会的定居化与内地化	194
第七章	台湾建省后的行政建置与闽台关系	200
第一节	海防危机中产生的台湾建省之议	200
一	沈葆楨对台湾地位的洞明和为建省所做的前瞻 性工作	200
二	中法战争中台湾战略地位的再凸显	205
三	左宗棠提出台湾建省主张	209
第二节	百业并举的建省工作与近代化建设	213
一	建省中的缓急轻重之争	213
二	“抚番”、“清赋”：建省的基础性工作	217
三	以海防为中心的近代化建设	222
第三节	地方建置的完善与闽台关系	226
一	建省后的省级官制、职权划分及省城规划	226
二	郡县的扩充与健全	231
三	闽台“联成一气”的关系	236
第八章	日据时期的闽台政治关系	241
第一节	割台初期的闽台政治关系	241
一	关于日本割占台湾的法律解释	241
二	闽台官民反对割让台湾的努力	245
三	日本占领初期闽台政治态势	250
第二节	台湾抗日爱国人士在大陆的活动	255
一	台人在福建等地组织各种抗日团体	255
二	李友邦的台湾义勇队与福建	264
三	福建：台湾人投奔祖国大陆抗战的重要出发点 ...	268
第三节	台湾光复与福建	272
一	闽台人士力促国民政府收复台湾	272
二	福建与战后台湾接收工作	277
第九章	战后台湾回归与建置	284
第一节	国民政府收回台湾的努力	284

一	“收复台湾”口号的提出	284
二	收复台湾目标的明朗化	290
三	收复台湾的实现	296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恢复台湾省制的设计	302
一	恢复台湾省制的预案	302
二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的实施	306
三	台湾省制的恢复与地方建置的完善	311
第三节	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国际法依据	316
一	《开罗宣言》的国际法效力问题	316
二	《旧金山和约》的违法性	321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台湾的法律权利	327
参考文献		331
附 录	新发现乾隆时期台湾彩绘地图的研究	338
后 记		351

第一章 绪 论

福建与台湾处于中国东南地区，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属于边鄙之地，在汉族文化到来之前，发展相当缓慢。福建在汉代还被视为“瘴疠之地”；隔海相望的台湾，则一直到宋元仍处于刀耕火耨的原始生产方式。以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比照于被认为同为记载台湾土著社会状况的三国时期的《临海水土志》相关内容可以发现，台湾土著居民社会在这千余年间，没有多少实质的进步。台湾社会的实质进步，与福建一样，都是在汉族移民到来以后。尽管二者的发展不是同步的，但其间的前后时差，恰好构成一种开发顺序的时间衔接链。

笔者一直以为，台湾历史的发展，是福建历史发展的延伸部分，离开福建的开发史而孤立地看待台湾开发历史，便抓不住台湾历史的本质，也抓不住台湾文化的本质。而福建历史的发展，离开了汉族文化南移，离开了汉族移民胼手胝足的开发历史，便理不出头绪。因此，从福建到台湾，整个东南地区开发的历史，当作为一个整体观。也就是说，整个东南区域的历史，是一部汉族文化迁移、开发东南区域，使东南区域从少数民族散居的荒莽之地发展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历史。无论其历史差异性如何，都应该先抓住这个最本质的线索。经济史如此，政治史也同样如此。研究闽台地区的行政建置，首先必须有这样的历史高度或立足点，才能看清种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及其内在关系。基于此，笔者想在这里先就东南开发历史中的行政建置，以及

闽台政区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质，阐述一些基本的认识。

一 东南开发浪潮与闽台建置

华夏文明的母体是一种内陆江河农业文明，秦汉以后，母体文明的重心，总体上呈向东、向南转移的态势。从地理空间来看，东南区域与华夏文明中心是同一文明体系内部的表里关系。在华夏文明发展的早期，东南区域属于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但其自然条件相近，地理相通，是华夏农业文明的天然延伸区。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东南地区的原始农业，很早就受到华夏文明的熏陶。福州闽侯黄土垅商周遗址文物中，有一种陶制鼓形器，与湖北崇阳出土的商代铜鼓造型相似，显示该陶鼓系模拟中原青铜鼓而制。陶鼓在先秦古典籍中称为“土鼓”，起源于传说中的神农时代，《周礼·春官》记载，每年寒暑交替时节，农夫都要用土鼓等乐器击奏，祭祀掌管农事之神“田祖”以祈祷风调雨顺。这种祭祀农神的专门乐器的出土表明，古代闽越族的原始农业，与华夏族农业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它与其他同样模拟了中原风格的器具，还表明了东南区域闽越族对中原主流文化的认同。

东南区域与中国主体文明发源地之间的这种天然联系，是以后汉族文化进一步影响乃至直接开发东南区域的基础。综观东南区域发展的历史，其开发进程波浪起伏，逐步推进的特征非常明显。东南区域的行政建置，首先就是这些开发浪潮的产物。

大而言之，东南区域开发经历了三波大的浪潮。

1. 战国秦汉之间，东南区域史上第一个正式王国——闽越国的出现，标志着东南开发第一波浪潮的掀起。

东南区域早期的历史相当滞后，在先秦时代还没有完

全进入阶级社会。大约在战国中期，位于闽地东北部的越国被楚国攻灭，越王室一部分成员逃亡入闽。这些王室队伍の入闽，对东南地区的发展显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越国长期参与中原霸业的角逐，饱受华夏文化浸染，他们不但具有比较成熟的政权组织经验，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东南区域的开发是个重大的推动。到了秦末，从他们已经能够起兵为恢复自己被秦皇剥夺的尊号而战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东南区域的开发已经取得初步成就。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为表彰闽越族倒秦佐汉之功，刘邦封闽越族首领无诸为闽越王，以闽中故地立国。

闽越王国的设立，为东南区域的开发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无诸带回的是一支驰骋中原战场多年的队伍，他们不但已具备较高的军政素质，而且广泛见识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这支队伍为骨干，再加上汉初东南地区大约六七十年的平静无事，闽越国国力增长神速，到汉武帝即位时，闽越国已是南中国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公元前 138 年，闽越国出兵围攻东瓯国（今浙南、闽东北一带），迫其北迁于江淮之间，尽占其辖地。三年后，闽越王郢又发动对南越国的进攻，惹来汉军压境，闽越王弟余善杀郢谢罪，才平息了事端。郢被杀后，汉朝继封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而余善拥兵自重，欲自立为王，汉朝也只好封他为东越王，这件事说明，汉王朝对闽越国也有所顾忌。

鼎盛时期的闽越国，据淮南王刘安称，“甲卒不下数十万”^①。它标志着东南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兴旺状态甚至令王室成员兴奋地联想到他们祖先勾践的辉煌霸

① 班固：《汉书·严助传》，二十五史缩印本第 1 册，第 62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业，汉朝大臣严助指出：闽越王“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①。这样一个强盛的王国，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东南区域开发的程度。

推动这波开发浪潮的主体力量虽是闽越族，但其物质和精神动力都来自华夏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以后，中原农业进入牛耕和铁制工具的时代，个体农业生产成为可能，由此推动了一场以大片开发荒地为主题的农业革命。农业对气候和土壤的要求，决定了这场革命只能朝南、东方向推展。在井田制时代被目为南方蛮夷的荆楚吴越之地，这时都纷纷崛起称王称霸，正是华夏农业文明开始南移的生动体现。到了战国后期，以华夏族为主体、夹混着夏夷融合浪潮的农业开发，已延伸到长江下游南岸的广大地区。这时华夏农人虽未直接进入闽越之地，但这场农业革命的余波，显然也已冲击东南。东南区域正是在这时开始了逐步融入中国主流的开发历史。汉封闽越国，更为中原农业革命成果在东南地区的推广铺平了道路。南方茂密的原始森林为矿冶业提供了丰富的燃料，闽越的冶金业很快超越北方。考古资料显示，从汉初开始，福建地区铁器的使用猛然普及起来，“单从闽越故城这一典型遗址来看，铁器在各方面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中原地区通常的遗址”^②。闽越国不但能制造出中原一带常见的铁器，还制造出大量适合于闽越人“水行而山处”的生产、生活特点的器具，如钺、拨铲、鱼镖、鱼叉、凿型器和一些管、钩、尖状杂器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器具，不但反映出当时

① 班固：《汉书·严助传》，二十五史缩印本第1册，第6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② 杨琮：《闽越国文化》，第31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闽越国已有大面积垦田和农耕的能力”，“稻作农业已成为闽越国经济的基础”，^① 而且反映出闽越人固有的渔猎生产和航行能力的进步。可以说，东南区域第一次开发浪潮，是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与闽越族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的产物。

2. 唐宋之间，东南区域掀起第二波开发浪潮，宋元福建经济文化的全盛，是这波浪潮的顶峰。

闽越国因公然反叛中央朝廷，于公元前 111 年被汉朝所灭。限于当时统治的技术条件，汉武帝对桀骜不驯的闽越族采取了“取其民而弃其地”的策略，将闽越之民强行迁徙于江、淮之间，东南区域的历史一时陷入谷底。几十年后，散置各地山野的闽越遗民逐渐聚拢，才组成一个县级建置，称为冶县，归会稽郡管辖。三国时，出于拓展领地、巩固后方以便与曹操、刘备争雄的需要，孙吴政权重新注重对东南区域的开发经营，派将军贺齐领兵平定闽江上、下游的骚乱，并增设了 4 个县级地方建置；两晋间，北方战乱连年，随着汉族南移的潮流，少数汉人人闽定居。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使东南区域的发展逐步走出低谷，踏上新的发展之路。

唐至五代间，多种政治风云际会，进一步促成了东南区域的开发，并奠定了这一区域走向历史新高峰的基础。一是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受命入闽平乱，设置漳州，促成了闽南广大地区的开发，进而形成闽南新开发区与东吴以来已得到较好开发的闽江流域相互呼应，由点到面，连线成片的开发格局。二是中唐安史之乱后，移民东南的汉族农民骤然增多，而此时东南山区已开发较为充分，人口容量有限，大批移民只好向低洼地带和沿海进军，大片荒

^① 杨琮：《闽越国文化》，第 450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滩、湖泊、盐碱地和沿海滩涂被改造成良田，可以说，到了晚唐，农业开发的触角已延伸到东南大陆所有的适宜地带，从经济角度来讲，东南大陆地区已具有全国中等的发展水平。三是唐末、五代时，王潮、王审知入闽，对东南区域展开全面的经营，在当时全国混乱的局面下，二王明智地选择保境安民、修明内政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开拓海运事业，不但为东南地区赢得 33 年安定建设时间，而且因其在当时相对属于一方乐土而吸引了大批人才和劳动力，使东南开发步入更加综合、全面的轨道。

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是这波开发浪潮的突出特点；与此相伴随的，同样也有生产力的革命性变化。水利技术、围垦技术的进步，新式灌溉工具（水轮筒车、龙骨翻车）和轻便农具（耨刀、踏犁、秧马）的发明，粮食品种的改良，耕作制的改进，经济作物的推广，构成这一时期农业技术创新成果的辉煌体系。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具有耐旱、生长期短的特点，不但适宜于山区旱地，而且使南方大片平原良田实现了一年两熟甚至一年三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和土地利用率。技术创新既使农业开发无远弗届，过去无人问津的山地、洼地和滩涂皆可为良田，而且耕作过程也越来越精细，土地潜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精致农业在这里被运作得极其透彻。事实上，唐宋时代的大多数农业技术创新，都是率先在南方地区实现的。占城稻就是最先由福建引进，然后推广于江淮，福建是全国最早实现一年两熟制的地区之一。当时福建在围海造田、陂塘建筑、水车灌溉、品种改良、经济作物引种等方面的技术运用，都属于全国领先水平。生长期约百日的占城稻被引进福建后，被改良成了早占城（又名六十日）、晚占城、八十日、红占城、寒占城等十来个新品种。据《淳熙三山志》记载，宋代福州一带水稻良种

达 20 多种。福建应用水车灌溉技术后的土地开发程度，被生动地描述为：“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

在上述开发的基础上，宋元时代，东南区域的发展跃上了新的高峰。宋初设福建路，辖六州二军，从此奠定“八闽”齐进的基本格局。史书描写宋朝福建路“民安土乐业，川原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①，粮食充足使人口大幅增长，200 多年之间，福建从全国人口相对稀少地区一跃而成人口密集乃至过剩地区。手工业也取得长足进步，制盐、制茶、制瓷、造船、矿冶等业全国闻名，银、铜、铅、金、铁的生产在全国名列前茅，锡的产量在全国也占突出位置。商业经济也达到空前规模，在此基础上，元代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被称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巨港之一。翻开福建地方史志可以发现，福建绝大部分社会事业设施和公益建设项目，均起步于宋代。福建人在全国舞台上尽领风骚，当时就有人感慨：“而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② 据统计，两宋间，福建考中进士者达 5986 人，占全国总数近五分之一，其中官至宰相者多达数十人。总之，当时福建经济社会呈现出一种全盛的状态，它标志着东南区域发展的又一个历史高峰。

3. 从明清到近代，以开发台湾为主题的开发热潮，标志着第三波东南开发浪潮的到来。

台湾作为东南区域开发的一部分，早在第二波开发东南浪潮的初期就已见端倪。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吴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军“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和隋朝三次派兵入流求（台湾）。这几次事件虽然都以虜归人口而告终，但至

① 脱脱：《宋史·地理志》，二十五史缩印本第 7 册，第 30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② 陈必复：《南宋群贤小集·端隐吟稿序》。

少说明台湾已经进入大陆政权的开发视野，只不过限于当时统治的技术条件，只能权宜这种取其民而弃其地的方式，与汉武帝迁闽越之民于江淮之间的做法，出于类似思维。

宋元以后，福建开发已臻完成，其雄厚经济技术条件和人口过剩所产生的强大辐射力，必然促进开发浪潮涌向东南区域的表层空间——台湾这块农业宝地。“鸿荒甫辟，土膏愤盈，一岁三熟，厥田为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① 开发台湾的主力军，就是过去开发福建的主力军的后裔，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能表明台湾的开发是整个东南开发进程的一部分了。从明末到近代，大陆移民台湾大体有四次高潮。一是明崇祯年间应郑芝龙之招徕，大批沿海农民入台垦殖；当时窃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也采取鼓励大陆移民政策。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带去大批官兵、家属以及受招徕的农民。三是清朝统一台湾并解除海禁后，入台人口大增。四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建省引起的又一次移民高潮。

与这四波移民潮相对应的，是台湾开发地域的一轮轮的拓展。汉人到台初期和荷兰殖民者统治时期，开发地区主要局限于台南附近；郑氏政权时代，开始分别往南、北拓展到高雄、嘉义等地，有些开发点分布到北部的鸡笼（今基隆）、淡水及台中等地；清朝统一台湾后，开发大军开始大规模向北部推进，原先的开发点也逐步扩大，连成一片，到嘉、道年间，台湾西部及宜兰地区绝大部分已开发完毕；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沈葆楨受命办理台湾事务，开辟东西通道以促进台湾东部开发。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台湾正式升格为东南区域的一个省份，在首任巡抚刘铭传的主持下，开发区域继续向各高山荒埔延

① 魏源：《圣武记》卷八。